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一辑）

Primitive society

初民社会

〔美〕罗维(R.H.Lowie)著 吕叔湘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一辑）

Primitive society

初民社会

〔美〕罗维（R.H.Lowie）著 吕叔湘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民社会/(美) 罗维 (Lowie, R. H.) 著; 吕叔湘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历史学)

ISBN 978-7-5520-1264-4

I. ①初… II. ①罗… ②吕… III. ①世界史—上古史 IV. ①K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930号

初民社会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380千字

印 张: 37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0-1264-4/K.333

定 价: 166.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美〕羅維（R.H.Lowie）著 呂叔湘 譯

初民社會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著者序

誰要請求人類學者介紹一本書，將人類學或人類學的任何分支給門外漢一個簡短的提要，人類學者便要大大爲難。他們不得不承認，現在還沒有什麼書能綜合現今研究成績，治爲一篇，恰能應問者所求。在人類學的各部門中，尤以社會組織這一門最爲痛切地感覺缺乏一本跟得上時代的提要書。社會學者、歷史家，以及研究比較法學的人，都需要人類學上的材料，可是因爲沒有良好的書作嚮導，他們只能求之於摩根的古代社會（Morgan: Ancient Society）。摩根著此書時，科學的民族誌之學還在萌芽時期。自一八七七年以來，人類學者不獨已經蒐集了無數具體資料，且已發展了好些新方法和新見解，使摩根的書成爲無可挽回的古董。他的書誠然不失爲一個聰明勤苦的學者筆路藍縷的成績，可是，今日之下還要向那裏面求關於初民社會的知識，這簡直等於向達爾文以前的生物學者那裏學生物學。摩根的書是研究人類學歷史者所必讀，卻萬萬不

足供現代一般讀者之用。

前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講學一年，見修習人類學諸課的學生也因為缺少此類論述初民社會組織的入門書而大感困難，其程度不下於一般讀者以及研究與人類學相關諸科的人。為供應上述三種讀者的需要，寫成此書，用以闡明近今美國人類學者的態度。

此書之成，得力於共事諸君者甚多，難於畢舉。首當致謝於業師波亞斯教授 (Prof. Franz Boas)，提倡用科學方法於人類學的健將。次致謝於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威斯勒博士 (Dr. Clark Wissler)，因博士之力，始克具有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實地經驗，在我們的共同的專門研究範圍即平原區中尤其得博士不少的誘掖。更致謝於克裏伯教授 (Prof. A. L. Kroeber)，使著者有於一九一七——一八學年在加州大學講學的機會，始得整理自己關於初民社會的見解，因而間接形成此書。加州大學其他學系諸同事中多有於人類學理論感覺興趣者，給我不少鼓勵。使我受益尤多者為我的朋友今在西北大學的菲爾伯利克教授 (Prof. Francis S. Philbrick)，他在比較法學上的博學增廣我對於初民法律的見解。最後致謝於我的朋友美國自然史博物館 Leele

Spier 君，在出發以前爲我讀第二章至第八章的原稿，並賜以明敏的批評；致謝於 Bella Weitzner 女士爲本書作索引。

Robert H. Lowie

譯者記

本書著者羅維 (Robert Heinrich Lowie) 一八八三年生於維也納，十歲時舉家遷美，入了美國籍。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從 F. Boas 教授治人類學，一九〇八年授博士。旋入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爲研究員，凡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起任加州大學教授。他的專門研究是北美平原區。他的著作除論文專刊外，單行者有文化與民族學 (Culture and Ethnology, 1917) 初民社會 (Primitive Society, 1920) 初民宗教 (Primitive Religion, 1924) 國家之起源 (Origin of the State, 1927) 我們文明嗎 (Are We Civilized, 1929) 諸書。

在人類學者中羅維屬批評學派。波亞斯 (Boas) 爲此派大師，羅維及威斯勒 (Wissler) 克婁伯 (Kroeber) 哥登衛塞 (Goldenweiser) 等人俱其高足弟子。批評派反對摩根等人的一系演進論，對於葛拉本納 (Graebner) 及伊里斯密斯 (Elliott Smith) 等人的極端主義的傳播論，也深

致不滿，他們主張以文化解釋文化，以一民族之文化歷史及文化環境（別於自然環境）解釋其現有文化，其研究方法之周詳審慎有足多者。但如詳細敘說其理論，比較其與演化論派及傳播論派之異同，真是「說來話長」，在此地憑空說幾句也難搔着痒處。本書讀者大約也不需要此種初步說明，倘若要的，請閱林惠祥著文化人類學（商務）第二篇，最好還是讀完本書自行抽繹，較為有益。

本書初次譯稿於一九三一年秋交商務付印，不到半個月便發生九一八事變，那時決沒有想到四個月之後，這部譯稿，也要爲國難而犧牲。現在商務印書館的好意，約我把這部著作重譯出來。惟我第二次譯稿動筆不久，便因病中止，其後作輟無常，倘若沒有友人吳漢章，張貢粟，孫其敏諸先生幫助翻譯第九（吳），第十（孫），第十二（張），第十三（吳）各章，恐怕到此刻還不能告成，感謝之忱，非言可喻。這四章譯稿均經譯者本人校讀一過，倘有錯誤，應和其餘各章同樣由譯者負責。

譯文力求信達。原文間有三數誤刊處，顯明者改正，疑似者註明，其餘加證的地方也全是譯者

的註。原書參考書分章標指，茲爲便利計與總目同列書後。辭彙及民族譯名表均爲讀者便於對照而作，除民族名外，人地名及重要術語仍於初見時附錄原字。

譯者。一九三四年歲除。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	---

第二章 婚姻	一七
--------	----

一 婚姻禁例	一八
--------	----

二 獲得配偶方法	二一
----------	----

三 優先婚配	三一
--------	----

第三章 多偶婚制	四七
----------	----

一 一夫多妻制	四七
---------	----